

# 春秋卿大夫的文献整理及其文化意义

——从元典生成看民族精神的确立

韩高年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春秋时期周室和列国的卿大夫对前代的书面文献进行搜集、考订与编纂, 将口传文献书面化、系统化, 并在政治文化实践中不断地引证和重新阐释, 从而确立了其元典的地位。卿大夫的文献整理活动不仅改变了前代典籍行将散佚的厄运, 而且还促成了元典的生成。这一过程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文化精神与民族性格在春秋时期的定型, 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 春秋; 卿大夫; 文献整理; 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09)05-0013-06

春秋时期, 随着物质文化的进步与政治、宗教及其他社会实践对文献取资利用的新需求, 因王官下移等原因而行将散佚的前代文献典籍及口述文献的著录、整理和充分利用成为必然的趋势。卿大夫阶层中的杰出人物是文献整理活动的主体。

## 一、政治文化实践的需要促成典籍整理

从典籍的发展看,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 “官守其书”, 典籍为官方所垄断<sup>①</sup>。章学诚依据《周礼》的记载, 在《校雠通义·原道》中描述了春秋以前官守其书的具体情况: “六艺非孔氏之书, 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 《书》藏外史, 《礼》在宗伯, 《乐》隶司乐, 《诗》领于太师, 《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 明乎官司失守, 而师弟子之传业, 于是判焉。”他指出孔子以前, 典籍为官府所掌, 因此六艺之文非孔子所作, 而是“官司失守”以后, 孔子对故籍旧典进行整理和传述的结果, 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春秋时期, 礼乐制度中的宗教色彩逐步淡化, 而其中蕴含的实践理性和政治理性被加以充分的注意, 记载前贤往行的典籍和文献蕴藏着对现实政治和社会实践具有参考价值的经验, 这就促使对前代典籍的整理成为各诸侯国一种内治和邦交的需要。这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朝聘会盟等政治实践促成的典籍整理活动。这种情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公元前593年冬, 晋国的士会<sup>②</sup>为调和周室诸侯之间的矛盾而聘问于周, 周定王设宴, 席间与士会论享礼, 士会不

知, 深以为耻。由此而引发了士会讲求三代之典礼, 以修晋国之礼法的行动。《国语·周语中》载, 随会聘于周, “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 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左传·宣公十六年》亦云: “武子归而讲求典礼, 以修晋国之法。”韦昭《注》云: “三代, 夏、殷、周也。”又云: “秩, 常也。可奉执以为常也。晋文公蒐于被庐, 作执秩之法。自灵公以来, 阙而不用, 故武子修之, 以为晋国之法也。”吴曾祺《国语韦解补证》云: “执秩是主爵秩之官。”徐元诰《国语集解》云: “修, 备也。执, 主也。秩, 官也。谓晋于是始备主三代典礼之官也。修执秩, 所以实行讲聚也。”徐说是。

搜集整理典籍在鲁国的卿大夫中也很突出。据《左传·文公六年》载: 秋, 季文子将聘于晋, 使从者搜求遭丧之礼的文献。从者曰: “将焉用之?” 文子曰: “备豫不虞, 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 实难。过求, 何害?” 据考, 其所查阅者即《仪礼·聘礼》之类礼文<sup>③</sup>。春秋时虽礼崩乐坏, 但周室犹存, 列国争霸尚尊天子, 以礼义忠信之道临诸侯, 因此是否尊礼重信甚至成为诸侯是否有实力的重要标准。据《左传》、《国语》记载来看, 在当时讲求礼法、整理遗典佚文, 并拥有阐释权, 是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手段。

典籍整理活动的第二种情况是基于个体社会实践的需要, 而对前贤往哲德行规范、人生经验方面言论的纂辑。卿大夫阶层对“志”、“谚语”及前代有识者之言的整理过程, 同时也是他们实践前贤的价值理想、追慕其道德人格的过程。郑国的子产、子大叔(游吉), 晋国的叔向、韩宣

[收稿日期] 2009-03-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礼乐制度及其变迁与春秋文体源流研究”(09BZW020); 2008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韩高年(1971—), 男, 甘肃永昌人, 文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子、魏绛等都表现出整理前代文献的自觉意识<sup>①</sup>。随着文献的编成，同时也积淀、建构、强化了由若干仁人志士所实践的价值信念和文化心理。经由孔丘整理传述前代礼乐制度，搜求编订六艺遗文并以为之教，遂建构了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与道德体系。

不论出于哪种动机，二者所导致的结果是一致的，即带有社会、文化、民族共同指向性的典籍的形成，以及以此为基础，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定型，团结了当时华夏各部落，使其成为一个拥有共同文化典籍的文化共同体。

著名学者钱存训指出，要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制作、保存、传播和散佚的流绪，更需要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背景中去研讨<sup>②</sup>。循此思路，从春秋时期卿大夫的政治讽谏活动中赖以取资之思想资源的来源方面，可以考察当时整理写定各种口述文献以及搜求整理前代各种典籍的迫切要求及具体情况。让我们从一个富有代表性的谏语的分析入手。《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夏，邲之战前夕，晋师救郑，及河，闻楚与郑盟，晋中军统帅荀林父欲还师。晋卿士会（随武子）进言于荀林父曰：

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芟荑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诗》曰：“於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竞惟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

从士会谏语中可以看出时人议政议兵思想观点的文献来源及其性质。士会认为楚人行事“择楚国之令典”、“能用典”而“典从礼顺”，故不可敌。士会谏语中提到的“典”、“令典”，显系书面文献，所引的《酌》、《武》均见于《周颂》，亦是。其余如“军政”、“武经”等似均为前代流传至春秋的口头文献。士会之言曰“闻”之云云，是先秦典籍所载引述前言故志之标志。

仔细考察，士会所引述的口述文献大约有三类：一是兵家之言如《军志》之类。“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以及“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一段话讲用兵之道，显系引述军志一类文献。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云：“此疑出古兵家言”，可谓有识见。

第二类是前代圣贤之格言。士会谏语引述“仲虺有言”者即是。杜预注：“仲虺，汤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后。”《左传·襄公十四年》中行献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襄公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尚书序》谓：“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以为以上诸子所引或即出于《仲虺之诰》。

第三类是礼家之言。士会所言“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一段言任人、治国以礼，显系礼家之言。

综合以上论述来看，春秋时期典籍整理活动的主要动力是社会政治与个体生活实践对于前代思想资源的取证需要，其主要特征是口述文献资源的书面化，以及根据文献内容将其类型化与系统化。以下试以类相从，撮述春秋时期文献的整理及其实绩。

## 二、编辑“前言”“故语”等口述文献而成《志》

由春秋以前的“学在官府”到春秋中后期的“学在四夷”，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经历了一次重大变迁。从中可以看到，由于学术中心的下移，官守典籍的封闭格局也被逐渐打破，周王室和诸侯公室的藏书向卿大夫及下层社会传播。典籍流传范围的拓宽，推动学术下移不断向纵深发展，这不仅使卿大夫阶层成为学术文化的主体，同时也昭示着我国学术文化繁荣和典籍初兴时期的到来。春秋卿大夫文献整理活动的实绩首先是对前代文献中富于现实指导意义的格言、训语及带有史志性质的相关内容的整理编辑，即编辑“前言”、“故语”等口述文献而成各类《志》。而引证、搜求各类《志》的，主要是列国卿大夫中的杰出人物。

“志”本义即记忆，所谓“在心为志”。引申而言，各种记录均可称“志”。“志”的具体内容非常丰富，可从先秦典籍中多次出现的“志曰”中归纳出来。《左传》中引用“志”的情况如下：

- 1 《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僖公二十八年》）
- 2 《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文公二年》）
- 3 《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文公六年》）
- 4 《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又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宣公十二年》）
- 5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公四年》）
- 6 《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

(《成公十五年》)

7 《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也。”(《襄公四年》“君子曰”引)

8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引)

9 《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襄公三十年》)

10 《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昭公元年》)

11 《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逆来者，天所福也。”(《昭公三年》)

12 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引)

13 《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昭公二十一年》)

14 《志》曰：“圣人烦卜筮。”(《哀公十八年》“君子曰”引)

按以上所引“志”的类型有《军志》、《周志》、《故志》、《前志》等，考其性质，则“《军志》，兵书”(《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杜预注)；“《周志》，周书也”(《文公二年》杜注)；“《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国语·楚语》)；《前志》即《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也”(《国语·楚语》韦昭注)。上述几类志，内容涉及军事、占卜、日常生活经验、礼俗、历史等，十分丰富。

再来看《国语》中所见春秋时期著名人物引述“志”的情况和志的具体内容：

1 《礼志》有之曰：“将有请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不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晋语》四赵衰引)

2 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楚语》申叔时语)

3 成子导《前志》以佐先君，导法而卒以政，可不谓文乎。(《晋语》六荀懿语)

4 夫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晋语》四赵衰语)

5 《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晋语》九士蒍谏智伯语引)

6 灵王城陈、蔡，不羹，使仆夫子皙问于范无宇……对曰：“其在《志》也，国为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景、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升、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庄公，郑几不封，栎人实使郑子不得其位，卫蒲、戚实出献公，宋萧、蒙实弑昭公，鲁升、费实弱襄公，齐渠丘实杀无知，晋曲沃实纳齐师，秦徵、衙实难桓、景，皆志于诸侯，此其不利者也。”(《楚语上》范无宇引《志》)

7 伍子胥云：王盍亦鉴于人，无鉴于水。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闾为石

郭，陂汉，以象帝舜。罢弊楚国，以间陈、蔡。不修方城之内，逾诸夏而图东国，三岁于沮、汾以服吴、越。其民不忍饥劳之殃，三军叛王于乾溪。王亲独行，屏营彷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见其涓人畴。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畴趋而进，王枕其股以寝于地。王寐，畴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觉而无见也，乃匍匐将入于棘闾，棘闾不纳，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缢，申亥负王以归，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岂遽忘于诸侯之耳乎？(《吴语》伍子胥引《志》)

8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对曰：“有之。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矫诬，百姓携贰。明神不蠲而民有远志，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虐而降之祸。是以或得神以兴，亦或以亡。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兴也，棗机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鸞鷖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郾。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周语上》载内史过语)

上引《国语》中“志”的实例，例1有《礼志》之称，是行为规范；例2、3、4是对《志》的作用的说明，唯例4《法志》之称不见于他书；例5似为谚语；例6、例7所引之《志》显然是记载各国历史事件以寓含戒戒的史志，例中所述春秋时期郑、宋、鲁、齐、晋、秦、楚等国的乱亡历史，皆见于《左传》等书，述者范无宇、伍子胥等人依据的可能是当时流传的口述历史或列国《春秋》；例8内史过转述的《明神之志》内容颇杂灾祥而包含若干三代兴亡的史影，当为巫史所传之史志。《国语·楚语上》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诵《志》”一语非常引人注目。依《周礼》“诵”为“乐语”之一种，《志》之可以用乐语诵，说明其形式为韵语。最初口耳相传，稍后出于讽谏的需要，由专人加以辑录而成书。

除了《左传》、《国语》之外，“志”的类型，还有见于《周礼》的由“诵训”之官讽诵于王前的《地志》(记九州形势、山川所宜)，以及《方志》(即外史四方之志，所以识记久远掌故)<sup>⑥</sup>等。

综合先秦典籍中的“志曰”或“志有之曰”的内容来看，“志”总的来说是记事、记言类韵语的泛称，但如具体来说，其内容和类型又表现出相当繁杂的特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王树民指出：“大致早期的《志》，以记载名言警句为主，后经发展，也记载一些重要的事实，逐渐具有史书的性质。”<sup>⑦</sup>刘起鈇《〈逸周书〉与周志》一文甚至认为《逸周书》(《周书》)是在《志》的基础上编成<sup>⑧</sup>。

### 三、诗关政教的传统与《诗》文本的结集

《诗经》的编成是春秋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

春秋时期搜求并集合分散各处的各类诗歌（由乐官合仪式之歌的“颂”与讽谏之用的《雅》及抒情言志之《风》），编成专供当时卿大夫在朝聘会盟及宴饮等语境下歌、赋、引证之用的《诗》文本，充分体现了赋诗言志、引诗足志、歌诗寓意的现实需要对《诗》文本编辑的迫切性。诗文本的搜求方式，则由相关制度得以体现，即采诗、陈诗、献诗制度。关于采诗制度，《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语引《夏书》曰：“道人以木铎徇于路。”杜注：“徇于路，求歌谣之言。”何休《公羊传解诂·宣十五年》亦曰：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又《汉书·食货志》云：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又《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扬雄《方言》附《刘歆与扬雄书》曰：

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适（道）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采（求）代语、僮谣、歌戏……

《说文解字》：“古之适人，以木铎记诗言。”段玉裁注曰：“适、辘、道三字同音，适人即道人。扬、刘皆谓使者采集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故许驥括之曰‘诗言’，班、何则但云‘采诗也。刘云‘求代语、僮谣、歌戏’，则诗在其中矣。”以上史料反映了西周及其以前有道人专门采集民间歌谣。《诗经》中十五国风包括北至燕、东至齐、西至秦、南至楚国北部江汉流域广大地区的诗歌。这些作品总是有人收集才得以汇编于一书中，所以自古相传采诗之说，应非向壁虚造；采诗制度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同时也是一种搜求整理诗文本的制度，通过对优秀作品的筛选，将其书面化，并按一定体例加以编辑，使这些作品有可能在上层统治阶级中及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与《诗》文本的编辑相关的另一种制度是陈诗、献诗之制。此举虽首先是观政的目的，但其实质也属于文献搜集整理活动，是地方性歌谣文本化和进入《诗》的一个重要途径。《礼记·王制》云：

天子五年一巡守（狩），岁二月……巡守（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孔丛子·巡狩篇》云：“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诗歌作品能集于周天子太师之处，编为《国风》，便是三代之时确实有陈诗、献诗活动最有力的说明。上古政简，天子同诸侯国之间并无严格的检查、汇报制度，更无关于新闻或政情通报的媒体。天子至各地，各诸侯国国君演奏当地民歌以娱天子，天子、公卿也借观诗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这就是陈诗。孔子说：“诗可以观”，即指此。《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季札在鲁的一番议论，则是春秋时陈诗以观的一个具体生动的例证。这些活动必然要有一定的规模，在一定的仪式上举行，听者、唱者都会有很多人。由这种习惯，遂发展出一种政治

生活中的通行口语——诗歌成为不同地区方言之间的交际通讯工具，所以说“不学诗，无以言”。由此看，陈诗以观的诗文本整理活动，还促进了当时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陈诗献诗之制亦指诗人将自己所作之诗在一定场合下陈于天子，借以讽谏或颂扬。《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晋语》六：“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左传·昭公十二年》：“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可见陈诗献诗以讽谏，原是卿大夫的一项重要政治职责。《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周穆王时“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诗·大雅·民劳》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小雅·节南山》的作者也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讟。”表明这一传统由来已久。还有一种情形是君子贤人献诗歌颂在位者，而后者借此以选才。《大雅·卷阿》一诗即表现了这样的场面，学者考察此诗文本，以为诗写周王与群臣出游卷阿，诗人陈诗以颂王。诗第一章说：“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诗中颂周王礼贤求士。末尾又曰：“矢诗不多，维以遂歌。”诗中“君子”指贤人。矢，陈献。“以矢其音”即指陈诗。所谓“矢诗不多”，乃是谦词。此章上文云：“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足见在这种场合参加陈诗活动的君子贤士人数众多，他们当时应各有所陈，天子、大臣以此而选才。所以这也是兼有文献整理与群体性的诗歌诵唱欣赏双重性质的文化活动。

由此可见，献诗陈诗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各诸侯国乐师将该地民歌进行初步编辑，选送天子处，使太师排练、演奏、唱诵。二是卿大夫及“在列者”自作诗以献于王庭而寓讽谏颂扬之意。献诗过程说不上是群体活动，但它是民歌由民间传至上层社会的渠道，借助各种仪式中唱诗、诵诗活动，民间社会与上层社会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得以进行有序的沟通，从而促进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文化整合与文化认同。

总的说来，《诗》文本的来源包括了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仪式乐歌，公卿列士自作并献于王而讽谏颂扬的诵诗，以及各诸侯国搜集编选而献于王朝的歌谣，还有采自各地的民间之诗。这些作品最初的数量，应比《诗》三百篇多，司马迁说“古诗三千余篇”（《史记·孔子世家》），应是可信的。至于“去其重”，删选而成《诗》的工作，今人已经证实孔子以前即已完成。但孔子以诗为教，对《诗》作过“正乐”的工作，可能对《诗》的编排体例、内容、文字进行过调整、校改，使其更合乎春秋卿大夫“造士”与取资利用的要求。

先秦时历史悠久的采诗、陈诗、献诗制度，既是一种文献整理制度，也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它不仅对诗歌的发展、传播、交流、提高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也从典籍的方面促进了中华民族“君子风雅”的理想人格的形成。

#### 四、“礼”的实践与《礼》文的整理、编撰

周朝初年设立史官掌管典籍，围绕着礼乐教化，形成

了一批经典。故《礼记·礼器》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经过周末大动乱和王室东迁，到春秋时期这些典籍已大多散佚。《国语·吴语》载：“周室既卑，诸侯失礼于天子。”随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下移，学术中心也开始由周王室分散至各诸侯公室，这是学术下移的第一阶段。此期周王室虽然还掌握着一些典籍和礼乐，但是一些大的诸侯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典籍，有了自己的学术和教育。“学在官府”由一个中心，分散为若干中心。《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国的韩宣子到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读《易象》和《鲁春秋》，不禁感叹曰：“周礼尽在鲁矣！”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郑子给鲁昭公讲少昊氏以鸟命官的典故，于是，孔子向郑子请教官制，“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郑子虽然来自附属鲁国的东夷小国，可他却深谙前代典籍。《论语·八佾》载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据朱熹《集注》，“文献”之“文”，指典籍，“献”指熟知历史典故的贤者。郑子即属此类人物。由此，孔子深切感受到王室学官失守、典籍流散、学在四夷的无奈。

春秋卿大夫出于以史为鉴和新的邦交政治对于礼乐制度中蕴含的政治理性和德行内涵的需要，对西周礼乐旧典的搜求整理和重新诠释成为一种超越了这些制度对主体外在约束性的内在的文化心理诉求。前文所引《国语·周语中》、《左传·宣公十六年》载晋卿士会聘周，周定王与之论享礼，士会不知，“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聚”即聚集、搜集。说明晋国的士会对周礼旧籍进行过系统的文献整理，其目的是为了改变在外交场合不知礼而陷于被动的尴尬局面。这样的情形在当时卿大夫阶层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郑国的子产、游吉，鲁国的叔孙豹、臧文仲，晋国的叔向、赵盾等当时卿大夫的杰出人物，都有过搜求礼典的实践或言论。

从消极的一面讲，数典忘祖不仅是个人的耻辱，同时也关乎家族的荣誉。《左传·昭公十五年》载：十二月，晋荀跣如周，籍谈为介。周景王享之，求礼器于鲁，籍谈不能对，王曰：“昔而高祖孙伯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有辛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归晋以王言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若卒以忧，不可谓终。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以丧宾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且非礼也。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礼，王之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忘经而多言，举典，将焉用之？”此处所云“典”即记载周礼的典籍。“典以志经”，经，即礼，可知最初之经典即记载礼乐制度之典籍。体现社会共同认可的规范的“礼”，成为判断社会实践和个人行为之是非的标准。“典以志经”，礼记载于典籍，拥有典籍，就等于拥有了对“礼”的解释权，拥有了权威。这就是春

秋卿大夫特别重视搜集整理前代遗留下来的各类礼典的重要原因。

从《左传》、《国语》中所记载的春秋时期的材料来看，为各种礼仪准确无误地举行而编订的礼文礼书已经编辑成篇。这些关于礼仪的篇章，正是号称中华礼乐文化基石的《仪礼》、《周礼》、《礼记》成书的文献基础<sup>①</sup>。鲁文公六年秋，鲁季孙行父将聘于晋，使从者查检有关丧礼仪节之文献。这一事件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编辑成篇的礼书。

据《左传·文公六年》载：秋，季文子将聘于晋，依礼使从者求遭丧之礼以行。从者曰：“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遭丧之礼有主国君，主国夫人，世子，聘君，使者父母，宾介之丧五等。《仪礼·聘礼》云：“聘遭丧，入竟，则遂也。不郊劳。不筵几。不礼宾。主人毕归礼，宾唯饗饩之受。不贿，不礼玉，不赠。遭夫人，世子之丧，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庙，其他如遭君丧。遭丧，将命于大夫，主人长衣练冠以受。聘，君若薨于后，入竟则遂。赴者未至，则哭于巷，衰于馆。受礼，不受殯食。……若有私丧，则哭于馆，衰而居，不殯食。归，使众介先，衰而从之。宾入竟而死，遂也。主人为之具，而殯。介摄其命。君吊，介为主人。……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为之棺斂之。君不吊焉。若宾死，未将命，则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将命。若介死归复命……”季文子所欲求者，盖即此记载丧礼仪节之文。

《礼记·杂记下》载：“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沈文倬先生指出，孺悲所书的《士丧礼》，其内容应当包括了今本《仪礼》中的《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丧服》四篇<sup>②</sup>。可见《仪礼·士丧礼》之文当时已经编辑成篇。

关于婚礼的篇章亦编成于春秋时期。《左传·襄公十二年》载：周灵王求后于齐，齐灵公问晏桓子。桓子对曰：“先王之礼辞有之：‘天子求后于诸侯，诸侯对曰：‘夫妇所生若而人，妾妇之子若而人。’无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则曰：‘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若而人”，即若干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阮芝生《杜注拾遗》）。“先王之礼辞”，即先代记载婚礼及其他礼仪之辞。由此可见春秋之前即已有记载天子婚礼仪节与礼仪用语的礼仪之书。今本《仪礼》有《士婚礼》记士之婚礼，而无天子、诸侯之婚礼，盖其亡佚不传之故。

此外，私学的兴起，以及其兴废继绝的历史使命感，也使得对“郁郁乎文哉”的遗文旧典的搜求整理成为当时学者的迫切需要。《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并且记载他曾修订整理过诗、书、礼、乐，又曾因鲁史记而著《春秋》，于《易》也颇为喜好，并为之作“传”。葛兆光指出：春秋时期“除了实用性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外，最重要的精神性知识大约仍是殷周时代沿袭下来的，历算与星占为主的天象之学，龟策为主的预测之学，象征为主的仪礼之学”<sup>③</sup>。上述几个方面的知识在春秋

以前皆为王官之学，春秋时皆濒临失传，孔子生当其时，通过各种渠道，广问博学，汲汲于恢复“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其学以礼乐为主，集合了西周以降之文籍及典章制度。儒家“六经”的形成，与孔子对前代及春秋文化教育典籍的总结、阐述、提高密不可分<sup>⑫</sup>。孔子的文献整理尤其是对西周礼乐制度的搜求整理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其工作就是在众多卿大夫文献整理的基础上适应春秋社会政治的需要而展开的，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于文献的现实需要。

典籍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得以形成和传播延续的物质

载体，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即“五经”。元典文本的产生虽始于公元前1000年甚至更早，但其被修订、筛选和重新阐释而最终成书，却是在春秋时期。春秋卿大夫通过文献整理使民族原创性精神得以系统化梳理，并物化成为以“五经”为代表的指导人们行动的典籍，同时又通过对这些典籍的不断引证和反复阐释而强化了其价值和功能，铸造了其元典的地位。

#### [ 注 释 ]

- ① 参缪钺《典籍述略》，见《缪钺全集》第一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 ② 士会，晋大夫，即随会，也即士季武子。因其封邑在随（山西介休），后更受范（今河南范县东南），故亦称随会、士会、范会。晋献公重臣士蒍之后。曾参加城濮之战，与赵盾谏晋灵公；此年将上军为六卿之一。士会为人忠厚正直，才干过人，鲁宣公十六年执晋政，平戎勤王，求典礼，修礼法。执政二年，晋国之盗尽逃于秦。此年论楚国内政之辞，征引《诗》篇及先贤之言，阐述德行政事典礼之重要性，详尽分析敌我形势，见解超人，极为深刻，展示出长于言辞的一面。
- ③ 参赵逵夫等《中国文学编年史·周秦卷》第二章“春秋文学编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④ 上述诸人均均为各国卿大夫中代表人物，《左传》、《国语》关于其言行的记载中既涉及到他们对前代典籍的整理活动，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对典籍重要性的认识，如韩宣子在鲁“观《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观乐

- 等事例即是如此，这说明在春秋时对卿大夫阶层来说，讨论典籍、整理典籍已是一种自觉的意识。
- ⑤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4页。
- ⑥ 参《周礼·地官·诵训》贾疏，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七册。
- ⑦ 参王树民《释志》，刊《文史》第32辑。
- ⑧ 刘起鈇《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 ⑨ 参杨天宇《〈仪礼〉的来源、编纂及其在汉代的流传》，《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 ⑩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刊《文史》第16辑。又见《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⑪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 ⑫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收《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 The Ministers' and Senior Officials'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HAN Gao-ni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 Abstract ]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Ministers and Senior Officials in Zhou Royal Court and Subordinate States collected, researched and compiled previous dynasties' written documents, transcribed oral literature into the written and systematic style, constantly quoted and renewably explained them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ractice, and thus established its meta-code status. Their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work not only avoided loss of previous books and records, but also produced meta-codes' generation. At that time their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objectively promoted the stereotype about spirit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 and had important cultural significance.

[ Key words ]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ministers and senior officials;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cultural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周蓉/校对 小舟)